

试析影响两岸互信的因素

□ 沈惠平

摘要: 建立和增进互信是两岸关系健康、平稳发展的关键,但两岸互信时刻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深究起来,两岸互信基础薄弱在于其影响因素众多,诸如两岸长期分隔等历史因素、“台独”分裂势力等岛内因素、两岸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等两岸因素以及美国日本等外部因素,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两岸双方的相互信任。

关键词: 两岸互信; 历史隔阂; 敌对心态 “台湾主体性”; 美日因素

DOI:10.16650/j.cnki.xdtwyj.2016.02.002

半个多世纪以来,两岸之间经历了从军事冲突与政治对立,到开放接触、经贸往来以及交流协商等过程,尤其是近年来两岸交流日趋密切和热络,双方朝和平、合作与和谐的方向发展。尽管如此,两岸关系在本质上仍然具有相当不稳定性,其根源在于两岸互信基础薄弱。深究起来,两岸互信基础薄弱在于其影响因素众多,诸如两岸长期分隔等历史因素、台湾岛内“台独”分裂势力等岛内因素、两岸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与问题等两岸因素以及美国日本等外部因素,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两岸双方的相互信任。

一、影响两岸互信的历史因素

在影响两岸互信的历史因素中,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两岸长期的分离及其产生的隔阂、“二·二八事件”以及台湾当局长期“反共”教育的负面影响等。

首先,两岸之间长期的分隔致使双方具有不同的历史经历,甚至是对同一历史经历的不同感受,影响着两岸民众看待和处理问题的态度,进而影响到两岸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否及程度。按照德国学者卢曼的观点,熟悉是信任的

前提。“只有在熟悉的世界信任才是可能的;它需要历史作为可靠的背景。”^①可以说,两岸之间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共同的历史记忆。由于两岸之间缺乏可靠的历史背景作为信任的前提,双方相互猜疑油然而生。尤其是,1949年以后国民党政权退踞台湾,由国共内战造成的两岸敌对状态至今没有结束,使得分隔60多年的两岸民众,往往对彼此有许多不了解,甚至误解。“两岸长期疏离与敌视带来了军事、政治关系的紧张,也导致了双方深深的不信任感。比如大陆担心台湾对国家认同逐渐淡化,与中华文明渐行渐远。台湾则对大陆的政治制度表示猜疑,对军事布局深怀恐惧,在‘逢中必反’心理的驱使下,台湾对大陆巨大贸易盈余也成为一些人忧心忡忡的借口,甚至发展到大陆人的品行都表示怀疑了。”^②简言之,两岸历史上长期敌对带来的“后遗症”并没有完全消除,双方之间的一些误会、误解依然存在,并由此产生互不信任感。

其次,由“二·二八”事件带来的选择性创伤难以得到治疗与抚平,迄今仍对台湾社会内部乃至两岸关系具有重大的负面影响。

作者简介: 沈惠平,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副教授。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台湾光复后，台湾民众本以为终于迎来祖国的政府，可以当家作主，岂料到国民党的专制独裁更加严苛，外省官僚对本省人长期的“政治歧视”，各种不平等待遇，使台湾民众逐渐由希望转为失望、愤怒，最终导致“二·二八”事件的爆发，其在台湾民众的心理上留下一道惨痛的历史伤痕。在事件过程中，许多台湾知名人士和大批民众被杀，死亡人数至少几千人。与此同时，还有不少人被逮捕或失踪或逃亡。“在‘二·二八’事件中，许多日据时期的抗日精英、爱国知识分子和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惨遭杀害，使许多台胞由憎恨国民党的暴行而发展到憎恨外省人、大陆人，进而激发出省籍矛盾和分离主义的悲情情绪。”^③“许多老一辈台籍菁英受到摧残，……台湾人民与国民党当局之间、本省籍与外省籍之间产生了严重矛盾与隔阂，给当代台湾政治生活留下了阴影。”^④所以，“二·二八事件”是台湾当代史上一个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它所造成的“二·二八情结”，至今在台湾政治生活中仍然有着一定的影响，也严重地影响着两岸之间的相互信任。

最后，台湾当局长期的“反共”意识形态教育，在台湾民众心理留下了难以想象的阴影，使台湾民众对祖国大陆的认识更多地停留在肤浅、消极的层面，从而对其产生疏感、恐惧感和不信任感。为了“反共复国”，国民党退台之后竭力倡导极端的“反共”意识形态，长年不断地以所谓来自大陆的“侵略”、“武统”进行“反共”宣传和教育，搅得岛内人心惶惶，惊恐不安，使人们产生“反共”的敌对心理和“恐共”的危机意识。换句话说，国民党退踞台湾后，为抗拒大陆的统一攻势，长期进行“反共”、“仇共”教育。李登辉执政时期，则利用1994年3月发生的“千岛湖事件”，谩骂大陆是“土匪政权”，挑起不明真相台湾民众仇视中共和大陆的情绪，促使台湾社会的“反共”、“仇共”情绪不断升温。2000年5月陈水扁上台执政之后，民进

党当局不断煽动分离主义意识，甚至叫嚣与大陆进行所谓的“圣战”，致使台湾社会的“反共”、“恐共”意识至今难以纠正。^⑤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后，一些当权者抓着意识形态议题不放，“搞‘民主’、‘人权’对抗，导致现今岛内民众的‘反共’意识仍然普遍存在，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不信任、对大陆社会制度不认同、对国家统一不接受”^⑥。简言之，由于台湾多年来的“反共”宣传教育，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心防”短期内仍难以拆除。

综上所述，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以来，两岸历史断裂、缺乏共同记忆。国民党在台统治初期的“汉贼不两立”，台湾当局长期对大陆的“妖魔化”宣传与“反共”意识形态教育，两岸长期的军事对峙，以及大陆在发展中自身的一些偏差与失误，也影响了台湾民众对大陆的观感与印象，加深了其“恐共心理”与对大陆的负面印象，给双方互信投下巨大的阴影。

二、影响两岸互信的岛内因素

在岛内因素中，“台独”分裂势力、“台湾主体意识”以及政党轮替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两岸互信。

首先，“台独”分裂势力的影响。台湾的“台独”分裂势力从未放弃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企图，且手法、策略不断翻新，并一再蓄意挑起两岸民众和社会对立，隔断两岸同胞的精神文化纽带，阻挠两岸交流与合作，刻意将两岸“和平红利”扭曲为“独厚特定阶层与大财团”，将两岸经济合作诬蔑为“台湾经济锁进中国（大陆）”，甚至声称一旦两岸统一，台湾民众的“民主自由”将受到严重损害，台湾的经济成果被大陆庞大人口平均后将立即化为乌有。他们这样宣传的目的，就是要恐吓台湾人民，使他们从害怕统一到拒绝统一。这引发岛内部分民众对两岸未来走向的恐慌与疑虑，进而对大陆产生不信任感。可以说，“‘台独’势力仍在顽固坚持和推行分裂主张，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是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美好前景的最大障碍。”^⑦尤其

令人担忧的是，李登辉、陈水扁执政时期推行的“去中国化”政策，让“台独”成为年轻人的“自然成份”。近年来，两岸关系看起来似有大幅度的改善，但台湾内部的大潮流依然往“台独史观”的方向前进。“近二十多年，‘台独’者已经成功的把台湾这三十年出生的年轻人对国家民族的观念，从‘中国史观’改成‘台湾史观’，再变成‘台独史观’，最近更进一步走到‘亲日史观’、‘日美史观’。也就是台湾这二十年里受教育长大的青年人，已经是用日本与美国的观点来看待‘中国威胁论’了。这可以由台湾近年发生的‘太阳花学运’以及‘反课纲运动’看到这种现象的浮现。”^⑧这种情形不利于两岸之间的交流交往，更谈不上建立互信了。

其次，“台湾主体意识”的影响。台湾在民主化过程中同时强调“本土化”，并形成了在一定程度上高度膨胀、自我封闭、与大陆对抗的“台湾主体意识”。台湾学者张亚中即认为，李登辉、陈水扁执政的20多年时间，通过谋求加入联合国、“修宪”、“去中国化”、“两国论”、“一边一国”、“入联公投”等政治运动，强化“台湾主体性”的包装，作为走向“台独”的实践，使得“一个中国”在台湾变得妖魔化，“我是中国人”在台湾也变成一个属于禁忌的话题。^⑨其结果是，在“台湾主体性”塑造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世代，虽然不像他们的长辈有深刻的“仇共”心理，但对大陆却充满了新的偏见和敌视。从族群接触与社会认同理论来看，目前大陆对台的各项交流政策及工作，理应可以达到其预期目标，即通过两岸经贸、文教及各方面的交流合作，拉近两岸民众主观情感，从相濡以沫，到休戚与共，但结果却事与愿违。近年来大陆努力推动两岸大交流大合作，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增强利益情感联结、厚植和平发展民意”的目的，“但未能根本扭转岛内‘台湾主体意识’上升、‘亲美媚日恐中拒统’情绪增强的趋势。这一局面对增强两岸社会互信和民族认同、削弱‘台独’社会基础不利”。^⑩

最后，政党轮替的影响。对台湾来说，政党轮流执政已是常态现象。但政党轮替，却可能使两岸的互信基础发生动摇。随着大陆的崛起和两岸民间交往越来越密切，大陆的实力和影响、发展和进步，活生生地呈现在台湾民众面前，并且与台湾的弱小和停滞形成鲜明对比，于是台湾民众的优越感变少了，压迫感和焦虑感增加了，对“被统”的恐惧感更为强烈了。因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并未带来统“独”民意的正向变化，反而出现了“统降独升”的现象。“在‘惧统’的心理支配下，‘台湾主体意识’更加膨胀，台湾人认同更加强化，‘台湾是一个国家’的观念更为增强，台湾前途由台湾‘全体住民’共同决定的主张更为大行其道，在两岸交往中对对等尊严、台湾优先的坚持更为敏感和执拗。……这样的社情民意为民进党阻挠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提供了基础，也为马当局迟迟不涉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深水区提供了理由，构成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一步深化的阻碍。”^⑪近年来，民进党在台湾岛内政坛中的重新崛起，“必然会对当前和今后的两岸关系之发展形成若干的挑战，特别是民进党至今不愿意放弃‘台独’分离主义的政治主张，不愿接受‘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等政治基础和两岸共识，从而使未来两岸关系发展的不确定性大为增加”。^⑫政党轮替不仅使两岸关系的未来发展充满不确定性，而且极有可能让双方互信陷入谷底，导致两岸关系濒临危险边缘。

综上所述，李登辉、陈水扁主政时期推动的“台独”分裂路线及其“去中国化”的教育，包括在血缘上否定自己属于中华民族、在文化上否定自己根源于中华文化，已经在台湾社会造就了不少“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的认知。“短期内，台湾内部自主性的升高不可忽视，尤其当所谓‘台湾主体性’已经凌驾绝大多数在台湾的政治意识形态之上时，影响台海现状的力量将更多元、更复杂。”^⑬李登辉、陈水扁推动的“去中国化”政策，不仅撕裂台湾内部的团结和谐，对台湾经济的永续发展

不利,而且使台湾不少民众对大陆的敌对意识依然存在,致使两岸之间难以建立稳固的信任关系。

三、影响两岸互信的两岸因素

影响两岸互信的两岸因素,主要包括两岸结构性矛盾、双方的制度性差异以及部分台湾民众的敌对心态等。

首先,两岸结构性矛盾,如政治分歧与敌对心态依然存在。两岸关系中的政治分歧问题包括两岸政治关系问题、两岸军事安全问题以及台湾涉外事务和参加国际组织问题。在两岸政治关系上,目前最为直观和现实的问题是两岸敌对状态至今没有结束。两岸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与冲突在短期内难以化解,其结果是,台湾社会对大陆仍然存在很大的戒备心态。如果顾虑没法消除,两岸之间的信任关系就难以建立起来。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阶段以来,尤其是两岸经济、文化、社会等多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显着成绩,在政治领域也开始探索打破政治僵局的可行路径,推动两岸民间开展政治对话。“但与此同时,两岸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互信不足,制约了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⑭目前在以和平方式结束两岸政治对立这一目标上,双方的主流民意是一致的。然而,要最终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国家统一的理想目标,需要有一个“过渡性的政治安排”。如果两岸对在“一个中国”框架下互利共存的政治现实均有这样的认知,并在双方互动过程中合情合理地彼此定位对方在国家内部的存在形式,两岸之间的互信就能较易建立起来,而且能为两岸关系持续和平发展创造一个更加良好的政治氛围。

其次,两岸之间的制度差异。两岸的发展在历时上有着时间点的差异,在共时平面上自然也就产生许多相互间的陌生与不理解。如果说过去阻碍两岸统一的障碍多多,包括经济差距、文化高低、社会差异、军事“威胁”、涉外矛盾等,那么随着大陆各项建设持续高速发展,今后可能剩下的最大障碍,就是两岸政治制度差异了。由于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

家大力推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霸权、台湾历届当局持续开展“反共”全民教育,使得台湾民众对大陆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缺乏客观、正确认知,对港澳“一国两制”实践不能全面、公正看待,充满质疑、困惑和偏见,因而产生强烈抗拒心理。^⑮换言之,1949年以后两岸分别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加上几十年来台湾当局和某些政治势力对大陆社会制度的刻意扭曲,对台湾所谓“民主成就”的渲染和吹捧,“很容易让台湾民众由于对大陆社会制度的不了解而产生某种恐惧和敌视,进而影响到他们认知大陆的心态。台湾当局和某些政党在两岸交往中,动辄以‘民主典范’、‘民主灯塔’自居,指责大陆‘专制’、‘不民主’,表现出对大陆社会制度的极不尊重”。^⑯由此产生双方对彼此的不了解、误解,甚至曲解,这相当不利于两岸互信的建立及深化。

最后,部分台湾民众的敌对心态。目前两岸对两岸关系仍处于“敌对状态”有着共同的认知,而要结束敌对状态,首先要结束敌对心态。概括起来,台湾民众对大陆的敌对心态主要表现为:台湾民众的“反共”、“恐共”、“蔑(视)共”心态,以及部分台湾民众的“反中”、“仇中”心态等。近些年来,随着大陆的崛起,台湾岛内“恐中症”逐渐发酵,部分台湾民众害怕两岸经济一体化后,大陆可能会利用经济力量左右台湾政局,以致伤害到台湾所谓的自主性。反过来说,如果说大陆民众对台湾有敌对心态的话,那也只是针对“台独”分裂势力的,体现在对“台独”分裂活动的高度戒备,对“台独”分子及其政客绝不姑息。此外,大陆民众对台湾曲解大陆善意相当不满。所以,台湾朝野如果因“大陆欠我们的,对我们让利是应该的”,甚至欲以“台独”阻力为借口,滋生对大陆“予取予求”的心理,则将贬损大陆对台湾的善意、诚意,也让大陆民众看不到台湾社会的厚道、骨气与大义,会激化大陆的“委屈”情绪,而形成两岸负面心态的恶性循环。由此可见,

“敌对心态对两岸深层互信的建立，对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有着严重的干扰与危害”^⑦。

综上所述，从“反服贸运动”到“反课纲微调”，以及两岸协议之签署频遭阻碍的情形，都突显一个事实，那就是两岸之间的认同与互信，仍存在极为脆弱的隐忧。究其原因，主要是迄今为止两岸之间仍然存在诸多结构性问题与矛盾，双方由于走上不同发展道路而导致的制度差异，以及近年来伴随部分台湾民众对大陆所持敌对心态而突显的所谓“恐中”、“反中”情绪。此种社会现象肯定不利于两岸之间建立互信的关系。

四、影响两岸互信的外部因素

两岸关系不仅仅是大陆与台湾的互动关系，也要考虑外部因素，因此探讨两岸互信问题，也需要考虑其外部影响因素。近代以来，台湾的命运与中国大陆的命运以及美日列强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的衰落，从而无法保护自己的领土台湾，使得台湾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被日本占据，让日本殖民统治台湾长达50年，留下了台日之间复杂的历史情结，尤其是在战后台湾形成了一批强大的亲日派甚至媚日派。另一方面，从台湾问题的产生、发展、演变历史看，每当岛内局势与两岸关系出现大的变动时，都有美国的影子出现。可以说，美国作为台湾问题最主要的外部因素，长期以来始终是影响两岸互信、制约两岸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

首先，美国因素。在台海问题上，美国最关心的是其国家利益是否得到保障，出于维护其在亚太地区主导地位的需要，对两岸关系始终抱持戒心。近年来美国高度关注两岸关系的发展，既担心过去陈水扁的“法理台独”冒险，也担心马英九积极发展两岸关系可能对美国利益的伤害，不愿失去对台湾的实质控制，以便确保台湾这颗在中美关系中的战略棋子。2008年马英九上台以后，美国一方面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乐见两岸密切的交流合作，肯定两岸在经济及事务性议题协商上取得的成果；另一方面，美国又基于“亚太战略”的

考虑，也担忧两岸关系“走得过快”，因此通过各种管道掌控两岸谈判的细节，继续在两岸问题上施加影响力，以维护美国的利益。美国一再声称，美国在台湾有重要利益，因此两岸商谈对美应具有相当的透明度。从台湾本身来看，不论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都高度重视对美关系，都特别关注美国立场态度，美国因素对台湾问题影响非常大，也进一步说明美国对台湾政治及社会有着极其深厚的渗透力”。^⑧概言之，1949年以来台湾与美国之间，不论在政治、军事，还是在经济、文化、社会，可以说已经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跨领域的紧密关系。美国几十年来对台湾有重要的直接影响力，台湾社会也对美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信任及亲近感，而这反过来，却不利于两岸建立互信关系，而且严重影响到两岸关系的深入发展。

其次，日本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比美国更不希望中国统一台湾，这是因为日本向来把台湾海峡看成自己的生命线，以贸易立国的日本害怕中国统一台湾会扼住日本的喉咙。众所周知，日本是个岛国，资源贫乏，生存空间狭小，十分重视其海上的运输航线。日本所需石油的90%以上是通过印度洋经马六甲海峡和台湾海峡运输到日本。日本政界称台湾海峡为其“海上生命线”。即使1945年战败投降后，日本对于台湾也并未彻底死心，钓鱼岛事端以及近年来台湾岛内“亲日仇华”思潮的兴起就是明证。近年来，台湾作为日美亚太防卫区域链条中的关键一环，既可帮助日本阻止中国大陆在亚太地区发挥影响力，又可为日本南下主导亚洲，成为地区政治大国提供支持，还可制约中国大陆未来走向深海的进程，并增加日中谈判时的筹码，可谓“一石数鸟”，日本自然不会轻易放弃这颗重要的战略棋子。在日本的鼓噪与利诱之下，台湾加强了与日本的安全合作。在马英九当局“亲美、友日、和陆”的地区平衡发展战略中，日本占有重要角色。在台湾安全架构中，台日安全合作是仅次于台美安全合作的部分。台湾借中

国大陆与日本争端升级的时机，加强台日关系，不进行两岸联合“保钓”，反而与日本签署“台日渔业协议”，加强双方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合作。由此可见，虽然台湾问题本身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在中日关系中，原来并不像在中美关系中那样重要、突出和敏感，但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日本独特的“台湾情结”，以及日台之间日趋紧密的政治经济联系等，使得日本成为除美国之外的另一个影响两岸互信、制约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

最后，国际反华势力。除美国国会人权小组、美国“西藏难民委员会”、日本“日台议员恳谈会”及“青岚会”等美日两国相关组织之外，国际反华势力的组成还包括了德国弗里德里希·瑙曼基金会、大赦国际 INGO 等。国际反华势力对两岸互信、两岸关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插手本属于中国内政事务的台湾问题，以“民主、自由”等借口将台湾问题国际化，支持“台独”势力进行分裂中国的活动，为“台独”分子从事分裂活动提供国际支持。另外，在民进党执政期间，台当局不断拓展在东南亚的“外交”空间，因为这一地区不仅在地缘、历史、文化上与台湾有着较深的渊源关系，而且这些国家或地区在领土划分、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等问题上和中國大陸存在较大分歧和冲突，甚至有些国家还将中国大陆的发展看成是对自身的威胁。因此，东南亚某些国家也“报之以李”，与台湾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相互间的军事安全合作关系，军方高层秘密互访日趋频繁，多次联合举行针对大陆的联合演习，目的就在于通过突显台湾问题为自己保存一条牵制中国发展的途径。近年来，随着南海局势的变化，2016年即将上台执政的民进党企图在南海问题上作出重大的政策转向，“民进党执政后会放弃对南中国海声称拥有主权的主张。”“民进党正在思考是否要放弃台湾当局以现有的断续线为界线对南海主权的主张。以前所谓的历史的水域与我们实际控制的区域还是有区别的。”^⑩蔡英文的南海主张，将对大陆在南海地区的维权行动带来一

定负面影响，也不利于两岸互信的建立。

综上所述，为了巩固和强化自身在东亚的战略优势地位，美国在延续“以台制华”战略的同时，也在根据亚太形势的新变化、美国战略的新需求以及美国与中國大陸关系的新进展，重新审视台湾对于美国亚太战略的现实意义。其次，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日本独特的“台湾情结”，以及战后日台之间的紧密联系等，使得日本在增进两岸互信、解决两岸关系问题上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近年来，随着日本加快走向“普通国家”的步伐，谋求更多地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其政治、军事影响力，其在台湾问题上必然会有更多更大的动作，在台海两岸的博弈中日本的作用将日益突显。就目前而言，日本尤其忧虑如果两岸走得太近，会进一步推动中国大陆强势进军海洋，而日本不仅与中国在东海存在领土纠纷，而且还竭尽全力在南海问题上搅局。^⑪由此可见，只有两岸夯实了互信基础，才能有力遏制美日因素的影响，限制美日势力的企图及其在台湾的活动空间。也唯有如此，才能更有效地消除国际反华势力对两岸互信、两岸关系的负面影响。

五、结语

历史记忆是影响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负面的历史记忆更是影响两岸互信的主要因素，它加深了双方民众对共有历史文化认同的隔阂，已经成为两岸交流与合作的障碍。1949年国民党退踞台湾后又大肆推行“反共教育”，“仇共”逐渐成为绝大多数民众的共同认识，台湾民众对于大陆在心灵深处变得愈来愈陌生，也愈来愈疏离。李登辉、陈水扁执政时期“台独”分裂势力的兴起及膨胀，尤其是民进党执政时期“去中国化”政策的大行其道，至今未能被根本扭转过来，严重地影响着两岸民众好感与共识的建立，从而造成台湾对大陆的敌视与歧视。加上两岸尚未正式结束敌对状态，部分台湾民众延续冷战思维，凡是大陆提出来的主张，就不假思索地予以排斥，这有利于以分离主义为核心的政治操作，

并以此制造和激化两岸矛盾，加剧两岸隔阂。更为严重的是，近年来“去中国化”、“反中”、“媚日”的思潮泛起，对“台独”及分离主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易言之，“台独”势力仍在顽固坚持和推行分裂主张，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是建立两岸互信、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美好前景的最大障碍。

当前台湾民众最为自豪的是他们的价值观、制度观与社会文明进步程度。对大陆的态度与观感，也不再全部关注大陆经济发展与经济规模的扩大，而是大陆的社会进步、文明程度的提高及人权观念的改变。近年来，大陆在强调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法制建设、社会建设、政治改革。提出“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等。^①这种政治改革趋向，会影响台湾民众对大陆社会政治制度的认同，至少减少对大陆政治制度的排斥，这将有助于两岸互信的建立，有利两岸社会的融合。

近年来大陆不断强化与台湾的交流合作，但是它却无法冲破美国长期以来与台湾建构的结构性关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客观上使得台湾对大陆的依存度不断增加，美国担忧这种改变会导致台海失衡、导致台湾脱离美国的轨道，因此美国势必加大介入两岸事务的力道。另一方面，日本政界一直有一个“台湾帮”，以“台湾帮”为核心形成的亲台反华组织，与台湾当局以及“台独”势力遥相呼应，成为破坏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和阻挠两岸统一进程的主要势力。此外，长期以来，在日本政坛存在着一种浓厚的“台湾情结”，许多日本人的内心深处，依旧怀念着强占台湾为殖民地的旧时代。未来上台执政的民进党当局如果勾结日本对抗中国大陆，无疑将使持续紧绷的中日关系雪上加霜，中日矛盾激化，东亚局势将更加不稳定，这也将对台海局势和两岸关系造成负面影响，不利于两岸互信的建立。

注 释:

① (德) 尼克拉斯·卢曼著，瞿铁鹏、李强译：《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社，2005年版，第26页。

②蔡茂 《两岸如何“再见不会太遥远”》，(新加坡) 联合早报网，2015年2月18日，<http://www.zaobao.com/forum/views/world/story20150218-448434>。

③罗会钧、王栋梁 《台湾民众的悲情意识：缘起、影响及其化解》，《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④陈孔立主编 《台湾历史纲要》，九州出版社，2006年版，第226页。

⑤刘国深等著 《台湾政治概论》，九州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⑥⑬郑剑 《如何强化两岸的认同与互信》，香港《中国评论》，2013年第7期。

⑦《张志军：和平发展道路要行稳致远》，中评社长春2015年8月6日电。

⑧《谢启大语中评：台湾或成日本灭华计划牺牲品》，中评社北京2015年9月28日电。

⑨《认同与两岸关系》，香港《中国评论》，2009年第9期。

⑩《彭维学：大陆处理台湾问题的战略自信不断增强》，中评社银川2015年7月18日电。

⑪《王升：台湾政局重大变化 两岸关系三大挑战》，中评社香港2015年8月21日电。

⑫《陈先才：两岸关系发展的不确定性大为增加》，中评社银川2015年7月17日电。

⑬《黄奎博：台湾内部自主性的升高不可忽视》，中评社太原2015年5月30日电。

⑭《单玉丽：美国是制约两岸关系发展的障碍》，中评社银川2015年7月17日电。

⑮李鹏 《“两岸一家亲”理念下的“将心比心”思维浅析》，《台湾研究》，2015年第1期。

⑯徐青 《敌对心态是建立两岸深层互信的“软干扰”》，香港《中国评论》，2010年第10期。

⑰《李风：美国因素对台湾问题影响非常大》，中评社长春2015年8月9日电。

⑱史晓东 《试析蔡英文的南海主张》，香港《中国评论》，2015年第9期。

⑳《中评：日本为何对两岸领导人会面惊恐万状？》，中评社北京2015年11月23日电。

㉑王建民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两岸关系将产生正面影响》，台湾《观察》，2013年第12期。

(责任编辑：刘凌斌)